

※ 學術會議 ※

「中、日《詩經》學之比較研究」 學術研討會紀要

羅聖堡*

本所經學文獻研究室於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，廣邀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香港及臺灣各重點大學《詩經》學研究者，舉辦「中、日《詩經》學之比較研究」學術研討會。會中共同探究中、日重要《詩經》學者之相關著作，分析其研究觀念及經典詮釋之異同，確立各自於《詩經》學史上的價值與定位。

開幕式由二〇一八年「日本江戶時代《詩經》文本研讀工作坊」研究群暨本次會議主辦人，文哲所副研究員張文朝教授致詞。張教授首先感謝與會學者於白鹿颱風來襲之際參加會議。本次會議為研究群之延伸擴大，呈現更完整的研究內容，讓各方專家齊聚一堂，促進經學研究的國際化，以期將來有更多跨國經學之比較研究。研究群執行期間，曾舉辦二場專題演講¹、四場討論會²，部分成果於網路公

* 羅聖堡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。

¹ 第一場於 2018 年 3 月 19 日邀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莊雅州先生，主講〈毛詩名物圖說與毛詩品物圖考異同論〉，由文哲所副研究員蔣秋華教授主持。第二場於 10 月 19 日邀請時任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張寶三教授，主講〈日本江戶時代《詩經》圖及圖說中之《詩經》詮釋〉，由文哲所副研究員張文朝教授主持。

² 第一場於 2018 年 5 月 5 日邀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姜龍翔教授，導讀太宰春臺《朱氏詩傳膏肓》，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馮曉庭教授，導讀西山元文《詩經考》，由張文朝教授主持。第二場於 7 月 10 日邀請時任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張政偉教授，導讀日尾荊山《毛詩諸說》，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車行健教授，導讀齋藤芝山《復古毛詩》，由本所蔡長林教授主持。第三場於 8 月 29 日邀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張書豪教授，導讀八田華陽《詩經古義解》，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朱孟庭教授，導讀大田錦城《大小序說大序十謬》，由本所楊晉龍教授主持。第四場於 10 月 20 日邀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史甄陶教授，導讀中村惕齋《筆記詩集傳》，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田世民教授，導讀中井履軒《詩雕題略抄本》，由蔡長林教授主持。

開³。本次會議共有五場發表會，計十四篇論文，其中三篇為代宣讀。以下依序摘述各場報告之研究重點。

第一場

主持評論人：彭美玲教授（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）

發表人：水上雅晴教授（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）

題目：日本年號與《詩經》

發表人：陳捷教授（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研究科）

題目：江戶博物學與《詩經》名物學研究淺談

發表人：孫巧智女士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生）

題目：鈔本與刻本的牴觸與融合——以《毛詩》經注本衍化為核心

（由本所博士候選人盧啟聰先生代為宣讀）

日本改元為本年熱門的文化議題，水上教授為中文學界簡介日本頒定年號的程序，與年號代表的經學史意義。根據《日本書紀》的記載，繼體天皇七年(513)有百濟五經博士段楊爾到日本，其中可能攜帶《詩經》。推古天皇十二年(604)的《十七條憲法》已見《詩經》用典。日本從大寶(701-704)時期開始使用年號。森本角藏(1883-1953)統計大化(645-650)至昭和(1926-1989)年間的二四六次改元之中，採用《尚書》三十五次、《周易》二十七次、《後漢書》二十四次、《文選》二十二次、《漢書》二十一次、《晉書》和《舊唐書》同為十六次、《詩經》十五次。《詩經》是日本年號採用次數較多的漢籍之一⁴。

日本在明治(1867-1912)採用「一世一元制」以前，改元須經「改元定」朝議，其大致可分七個程序：1. 大臣奉敕先向幾位「年號奏進者」要求呈交「年號勘文」，每份勘文備有多個建議年號。2. 與會公卿從中「奏舉」幾個年號。3. 對「奏舉」年號進行「難陳」；「難」是否定意見，「陳」是贊成意見。4. 通過「難陳」篩選上奏二個候補年號。5. 天皇選擇一個年號。6. 與會公卿再次「難陳」。7. 天皇嘉納決定公布。「年號勘文」今見文章博士家高辻長成(1205-1281)編寫的《元秘別

³ 網址為：<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view/shijingwenben>。

⁴ 森本角藏：《日本年號大觀》（東京：日黑書店，1933年），頁73-75。

錄》。水上教授取之校勘經文，得出《尚書》部分來自日本國內《隸古定尚書》舊抄本，《詩經》部分與今本《毛詩》一致。日本接受宋學的情況尚待細部研究，就永和(1375-1378)之後的「難陳」而言，至少在十四世紀晚期，慣用漢唐注解的明經博士家，已開始使用宋學新注，而寬永(1624-1645)年號正式採用朱熹(1130-1200)《詩集傳》，標識朝廷已接受宋學。

陳捷教授主講〈江戶博物學與《詩經》名物學研究淺談〉。從漢代以來，學者對《詩經》名物的訓詁，一直是中國傳統知識體系之重要內容。特別是三國時代出現的陸璣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奠定《詩經》名物學之基礎，逐漸形成名物學的獨立領域，迄今仍有專門學者從事《詩經》動、植物的考釋研究。江戶時代學者受中國《詩經》名物學著作影響，十分關心《詩經》中出現的動、植物。大阪翻刻陸璣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江戶翻刻清乾隆年間學者徐鼎《毛詩品物圖說》，日本學者亦陸續出版相關著作，如淵在寬的《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圖解》。特別是十七世紀末以後，隨著本草學、博物學的興起，本草學者與博物學者也積極參與《詩經》名物學的考釋研究，尤其對其中的「和產」、「和名」有清楚的介紹，對《詩經》於日本的傳播有極大的貢獻。在本草學與博物學的背景之下，江戶時代中期以後，出版一系列中、日學者之相關著作。日本江戶時代出版中國的名物學著作，會先對其所抄錄之《詩經》文本與考釋成果，進行校勘、訓點與檢覆工作。出版品本身有學術價值，本講則集中於日本學者的研究論著。

天明五年(1785)岡元鳳(1737-1787)於京都刊行的《毛詩品物圖考》，是此類研究最受歡迎的著作。其對《詩經》出現的植物、昆蟲、動物提供簡潔明瞭的考證，插圖又精緻有趣，直到明治時期仍不斷印行。該書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傳入中國後也受到歡迎，清末、民國乃至現代，此書亦多次出版，廣為流傳。而高松藩儒醫松下見林(1637-1703)訓點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於日本國內有相當的影響力。江戶時期的醫生、博物學家和出版商常結合起來，共同出版名物學書籍，譬如抽印《通志》當中的〈昆蟲草木略〉，對此加以訓點、解釋。本草學者方面，小野蘭山(1729-1810)培養了一批《詩經》植物學的弟子，這些知識於醫療上有實際作用，能幫助鑑別藥物來源。至於江戶《詩經》名物學著作的流傳狀況，兼有刻本、抄本兩種形式，其中又以抄本為主，譬如稻生若水(1668-1746)之《毛詩小識》，作者生前雖未刊刻出版，抄本卻是廣泛流傳，於醫學暨本草學界深具影響。日本江戶時期的醫學教育以私塾為主，弟子入門有誓盟狀，不得將本門教法洩漏他人。由

於醫學與本草學者之研究成果常為機密，故其相關名物學著作，多以抄本形式於弟子間流傳。

孫巧智女士〈鈔本與刻本的牴觸與融合——以《毛詩》經注本衍化為核心〉一文，以《毛詩》經注的系統衍化為切入點，討論中、日兩國鈔本文獻和刻本文獻在競爭中互相融合的過程與特點。本文首先分析中國本土的情況，以五代監本為起始的刻本系統，憑藉其技術優勢和官方力量的推動，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，鈔本文獻受其衝擊逐漸萎靡。《毛詩正義》由於保存了鈔本系統的文本面貌，而被作為鈔本的替代，進入刻本系統之中。其次分析日本情況，作為博士家學傳統，鈔本在日本一直沒有斷絕，雖然地位有所下降，但仍然作為參校本，對刻本校勘發揮影響，發展出「拼合式」和「融合式」兩種融合形式。作者認為，從中、日兩國文獻傳承的經驗中，刻本與鈔本的消長，最終都以刻本取代鈔本，或以刻本作為融合的主導地位。基於這種共同性，作者呼籲在鈔本文獻日益被重視的當下，應用更加客觀的眼光，看待刻本的歷史意義。

第二場

主持評論人：車行健教授（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）

發言人：種村和史教授（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商學部）

題目：翁方綱之斷章取義說的性格以及其《詩經》學史上的位置

發言人：張書豪教授（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）

題目：八田華陽《詩經古義解》初探

發言人：史甄陶教授（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）

題目：論豬飼敬所《詩》學的詮釋視角與方法

（由本所博士後研究學者羅聖堡先生代為宣讀）

判斷先秦古人引用《詩經》是否任意託付意思，是分析詩篇涵義的重要工作。種村教授分析清代學者翁方綱(1733-1818)《詩附記》論述先秦古人賦《詩》、引《詩》「斷章取義」的特徵和意義，兼論《毛詩注疏》、《春秋左傳注疏》、《禮記注疏》、《詩本義》、《詩集傳》、清儒及日本江戶時期《詩經》學者之相關說法。本文主張翁方綱將「引《詩》斷章」與「斷章取義」視為同義詞。中國歷代學者一般認為先秦古人稱《詩》「斷章取義」多與原詩初義無關，翁氏則積極應用於經典

詮釋。古人「斷章取義」雖不能作為校訂字句的根據，種村教授從目的和意圖的層面，論述翁說的兩大觀點：第一，「斷章取義」能夠成為解釋詩句的根據。翁方綱認為古人「斷章取義」有與原詩相似的情境，意義不會相差懸殊。探討古人於何種情境、目的「斷章取義」，就能得到解釋該詩初義的根據，這與杜預(222-285)《春秋左傳集解》或《禮記正義》的態度完全相反。翁氏強調《詩》的本質有曖昧意義，詮釋者若抱持著欲具體敘述確切意思的態度，反而容易產生牽強附會的解釋。第二，「斷章取義」可以作為抓住詩意的根據。種村教授舉翁方綱對朱熹《詩集傳》的批評為例，關於古人「斷章取義」和原典關係之認識，朱、翁二人看法相反。朱熹認為，古人「斷章取義」完全不考慮原典的意思和內容，只是為了幫助自己的論述，隨便附加任意的意思；翁方綱則認為，古人賦《詩》亦被當時的情境所束縛，「斷章取義」不能完全脫離原典內容。對於朱熹的「淫詩」說，翁方綱認為或許有朱熹所謂「孔子收錄『淫詩』以警惕世人」的意義，但古人應不會在嚴肅正式的場合用「淫詩」比喻主客之情，以此否定「淫詩」說。種村教授云：「《詩經》常常缺乏考核作者之意圖的資料，所以拿古代的容受情況來追求『作詩之意』是必須的方法，人們認為在很多古代容受者中，孔子如何讀詩篇是最重要的。但是，用此例所表示的觀點來面對『斷章取義』的話，可以知道比孔子更接近作詩之時的人們如何解讀詩篇。」由此可見種村教授對於先秦古人「斷章取義」的重視。

種村教授推論翁方綱「斷章取義」說之學術淵源，第一點已見宋代歐陽修(1007-1072)《詩本義》⁵；第二點於清代姚際恆(1647-1715)《詩經通論》、戴震(1724-1777)《毛詩補傳》已有相同見解。本文最後比較翁方綱說與日本江戶時期《詩經》學者說法之差異。翁方綱從《詩》有曖昧性的本質觀點，看待古人「斷章取義」富多樣性與自由性的特色。伊藤仁齋(1627-1705)則以古人解讀有極大的自由度，將詩篇初義轉用成自己想表達的意思。荻生徂徠(1666-1728)亦持此說，古人「斷章取義」是種「用詩」的模式，而非翁方綱視為古人「讀詩」並解釋詩篇初義的模式。中國的《詩經》學者大多認為，《詩經》有道德教化之普遍性意義；日本江戶時期的《詩經》學者則由「人情」與「風俗」之不同，關心人所蘊含的各種情感。種村教授強調，日本江戶時期《詩經》學的這種觀點，是從中國明代《詩

⁵ 種村和史：《詩經解釋學的繼承と變容——北宋詩經學を中心に据えて》（東京：研文出版，2017年）。中譯本見李棟譯：《宋代《詩經》學的繼承與演變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）。

經》學而來，中國清代《詩經》學者很難發現這種痕跡。而明代《詩經》學如何影響日本？又如何於中國本土消退？需要更進一步的思考研究。

張書豪教授發表〈八田華陽《詩經古義解》初探〉一文。由於學界先行研究較少，張教授從生平簡介開始，論述八田華陽身處江戶末期，師從折衷學派學者井上金峨(1732-1784)，受清代樸學影響，異於江戶中期學者強調多元、任情解《詩》的風氣，帶有重考據、尊〈詩序〉的復古意識。《詩經古義解》二十卷，今僅存釋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一卷。八田華陽廣泛徵引先秦迄清相關文獻及中國歷代學者的訓詁解釋，其解經體例大抵是從〈詩序〉開始，綜合唐前古注及訓詁資料，解釋《詩經》的名物訓詁，藉由廣採古籍、以述代作的方式來訓釋義理。本文重心在第五節「《詩經古義解》的《詩》學主張」，歸納其釋「思無邪」、「四始」和「賦、比、興」說。八田華陽以「思無邪」為《詩》的內容，反對朱熹論為讀《詩》方法。他認為人的性情會因感於外物而產生變化，難保不受邪氣感染。至於〈關雎序〉的分別，八田贊同陸德明(556-627)說，認為〈關雎序〉一文全文連貫，不必再分〈大序〉、〈小序〉；而〈關雎序〉所謂「四始」，意謂〈關雎〉即〈風〉、〈小雅〉、〈大雅〉、〈頌〉四者之始。八田解「賦」標榜「以陳其情」，「比」為「比勘對照」，「興」為「引譬連類，以起其意」，認為一詩可容有二興，亦可興、賦並存。

豬飼敬所(1761-1845)的《詩》學意見，收錄在其養子豬飼彥續編纂的《詩經集說》中。此書常引朱熹、伊藤仁齋和中井履軒(1732-1817)三家說法，史甄陶教授〈論豬飼敬所《詩》學的詮釋視角與方法〉一文，從以下三方面來做討論：第一，由其對〈詩大序〉和〈小序〉的態度和解釋，分析其論《詩》之定位。第二，由其對朱熹〈詩序辨說〉的看法和對於《詩》的詮釋，討論他對朱熹學說的批判。第三，探究豬飼敬所《詩》學在研究方法以及思想上，較為獨特的看法。

伊藤仁齋認為〈詩序〉可以確保《詩》有經之定位，故對〈詩序〉提出正面評價，進而否定朱熹的〈詩序辨說〉態度。豬飼敬所雖曾受到伊藤仁齋的影響，但他支持〈詩序辨說〉，強調《詩》有「歌謠」性質，這與朱熹十分接近。同時，豬飼敬所完全接受朱熹的「比」、「興」定義，並且在解說例證當中，模仿朱熹的詮釋手法，以日本的里巷童謠、「馬子唄」和《古今和歌集》中著名的詩歌來做說明。由此可知，豬飼敬所較偏向從「文學作品」的角度欣賞《詩》，並非僅從經學的角度來看待《詩經》。此外，在〈有女同車〉、〈澤陂〉、〈昊天有成命〉的解說當中，豬飼敬所都採取朱熹的意見，而不接受〈小序〉的說法。

猪飼敬所支持朱熹〈詩序辨說〉，但不完全接受朱熹《詩集傳》的詮釋。其個人詮釋有兩種體例，一是明確標出他反對誰的意見，另一種則是沒有提到針對誰發言。然而只要是後者的情況，意見一定與朱熹不同，由此可以推斷，後者以朱熹詮釋為批評對象。統計猪飼敬所的批評對象，他對朱熹的異議最多。不過，相較於伊藤仁齋與中井履軒，猪飼敬所的批判較為溫和，但批評思維大致相同。猪飼敬所去除朱熹詮釋的超越性思維，不講抽象超越的本體論詮釋，反對帶有形上思維的宇宙論，重視從人道知天道的思想涵義。猪飼敬所正視歷史，有意識地使用先秦文獻，試圖回到比《毛傳》、鄭《箋》更早的時代，找到更接近《詩》之文本的涵義。他繼承伊藤仁齋視《詩》為發表人情的觀點，認為「歌《詩》出乎人情」，肯定人情或「氣質之性」的正面價值。此外，猪飼敬所另一個較特出的觀點，是會流露出神祕的宗教思想，譬如：解〈文王〉「文王在上」、「文王陟降」之語，認為不該從齊家治國的角度解釋，而是強調皇考之神靈對成王的警惕作用；解〈生民〉的重點不在祭祀，而是向神祈禱。這些解說都可以看出猪飼敬所對宗教思想的偏好。

第三場

主持評論人：黃忠慎教授（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）

發言人：姜龍翔教授（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）

題目：太宰春臺《朱氏詩傳膏肓》批評朱子之說法述評

發言人：張萬民教授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）

題目：朱熹「淫詩」理論中、日接受之比較

發言人：馮曉庭教授（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）

題目：《詩經考》「二〈南〉」詩解駁「朱熹說」綜述

姜龍翔教授回顧學界研究太宰春臺(1680-1747)《朱氏詩傳膏肓》既有成果，重新思考其斥朱熹《詩集傳》的根本原因。太宰春臺以《詩》本人情批評朱熹，但朱熹亦曾強調相同看法，其根本差別在於前者取之為教化之用，後者取之為修養之用。太宰氏主張六經各有其政治功能，《詩經》涵蓋各種人情類型，展示人民的善惡之言與真實感受，是執政者的施政參考。其解《詩》以簡明為原則，認為不必深論作者問題，亦不深求字義、章法，但以《毛傳》、鄭《箋》和漢代以前文辭古義來批評朱熹，分析《詩集傳》訓詁體式之錯誤。《朱氏詩傳膏肓》屢次批評朱熹不

取〈詩序〉，太宰氏則接受〈詩序〉出於孔門之說，即便部分說法有可疑之處，仍是當時最早的古人《詩》說。他反對宋儒用心法解《詩》，認為治心理論是釋氏之學，強調孔子傳布六經的意義在先王治道，遵行禮義便可規範人心。

張萬民教授〈朱熹「淫詩」理論中、日接受之比較〉一文，以「淫詩」說的角度，研究朱熹《詩經》學於日本江戶時代的接受歷史。歷代學者多從「鄭聲淫」與「鄭詩淫」的差別，批評朱熹的「淫詩」說。朱熹誤解或是有意誤讀「鄭聲淫」，用以支持自己的「淫詩」說。此類見解已成學界定論，但朱熹誤讀的結論，並未推翻「淫詩」說的理論意義。張教授分「作者端」與「讀者端」兩端，析論朱熹「淫詩」說在中國明、清時代和日本江戶時代古學派的接受狀況。朱熹「淫詩」說的理論核心，在於「淫者自作」說，他對《詩經》作者身分重新定義，認為作者思想有邪有正，進而強調讀者地位之重要性。讀者面對「淫詩」的「邪」、「惡」內容，應持堅強的道理立場，甚至以此為道德修養的檢驗方式，藉此「勸善懲惡」。就「作者端：淫者自作」的批評而言，本文舉出元馬端臨(1254-1323)、清毛奇齡(1623-1716)、陳啟源(?-1689)、姚際恆(1647-1715)、章學誠(1738-1801)，日本古義學派伊藤仁齋、奧田三角(1703-1783)、仁井田好古(1770-1848)等說。中國學者在批評「淫者自作」的同時，都極力恢復「美刺」、「寄託」的詮釋方式；日本學者則提倡「人情」說，反對宋儒論性命義理與天理、人欲之辨，承認「情」、「欲」的合理性與真實性。張教授認為，日本學者反對運用道德判斷與承認情欲之相關論述，其實變相地承認「淫詩」或「淫者自作」的存在及其合理性。就「讀者端：勸善懲惡」的批評而言，本文舉出宋王柏(1197-1274)、明程敏政(1446-1499)、清陶士傑(1692-1773)，比較伊藤仁齋、荻生徂徠、仁井田好古等人的說法。關於讀者面對「淫詩」的能力，中國學者大多沒有信心，過於戒備「淫詩」內容；但日本學者因對「人情」有更寬容的態度，認為「淫詩」仍有閱讀價值。張教授認為，朱熹的「淫詩」理論，突出讀者詮釋的作用與地位，重視讀者這一點上，日本古義學派學者與朱熹一致。

西山元文(寬政[1789-1801]時人)為日本江戶時期對馬藩藩士，學術屬性偏向古學派，其《詩經考》撰成於江戶中晚期，馮曉庭教授〈《詩經考》「二〈南〉」詩解駁「朱熹說」綜述〉一文，以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為主要範圍，參照《毛詩注疏》及《詩集傳》，藉此顯明西山元文取捨朱熹《詩》說的緣由與態度。以比較研究的方式，得出此書有四點特色：其一，《詩經考》兩度批評宋儒妄陋，西山元

文等古學派學者，對宋學及朱子學極度不屑。其二，《詩經考》駁斥《詩集傳》，表面看似針對朱子學，實際上是出自於對漢代《詩》學的信賴，其對《毛傳》尊崇有加，常引之為解釋依據。其三，《詩經考》兼取用漢代經傳，亦用宋、明字義訓詁，引錄文獻多元。其四，相較於《詩集傳》，《詩經考》解釋詩旨層面較廣，不但富含當代新說，亦能指摘新說弊病，古學派的學問實包含復古、新說兩種層面。

第四場

主持評論人：張素卿教授（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）

發表人：田世民教授（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）

題目：中井履軒的《詩經》解釋及其對朱熹《詩經》學的批評性繼承

發表人：張億先生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生）

題目：從《毛詩註疏校勘記》看《七經孟子考文》

（由本所博士後研究學者黃慧芬女士代為宣讀）

田世民教授論述中井履軒注解《詩經》的體例，是在朱熹《詩集傳》上標注前人說法和個人見解。中井氏之《詩經》學論著原稱《逢原》，後因增訂塗抹至不能讀，故將個人意見細書天頭，更名《詩雕題》，又有簡本別行為《詩雕題略》。中井履軒完成《詩雕題》與《詩雕題略》以後，再將前人諸說得失會萃成一家之言，修訂、刪節朱熹《詩集傳》，恢復舊名《古詩逢原》。由於《古詩逢原》的注解極多，田教授僅以其對朱熹《詩序辨說》的評論為線索，參照《詩雕題》之相關意見，觀察中井履軒解釋《詩經》的特色。中井履軒反對《史記》稱孔子將古詩三千餘篇刪為三百篇的說法，但是繼承朱熹「淫詩」說與王柏刪詩的做法，認為孔子應曾刪「淫詩」和僭禮之詩，進而刪去「淫詩」、〈魯頌〉計三十四篇，謂三百篇為《詩經》原數，孔子刪詩餘二百餘篇。朱熹雖對〈詩序〉多所批評，但仍有從〈詩序〉之處，中井履軒對於此處有所批評。換句話說，他更全面反對〈詩序〉，進而完足朱熹《詩序辨說》未穩當處。

張億先生〈從《毛詩註疏校勘記》看《七經孟子考文》〉一文，考察《毛詩註疏校勘記》的引據書目，《毛詩考文》共被徵引六〇三次，是《毛詩註疏校勘記》重要的參考文獻。但《毛詩註疏校勘記》頗不信《考文》古本，對《考文》宋本

信息也略有微詞。這是顧廣圻(1770-1839)等人爭強好勝的心態所導致的成見，而《毛詩考文》本身的不足，與顧廣圻等人的校勘方法與經驗，也影響了《毛詩註疏校勘記》對《考文》古本及其宋本信息的評價。《十三經註疏校勘記》不信《考文》古本，但《十三經註疏校勘記》的主編阮元(1764-1849)卻遵信《考文》古本，由此可見《十三經註疏校勘記》實際主事者段玉裁(1735-1815)，對阮元的意見只是選擇性吸收。

第五場

主持評論人：楊晉龍教授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）

發表人：李雄溪教授（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）

題目：竹添光鴻《毛詩會箋》解詁舉隅——與中國說《詩》者的對話

發表人：張政偉教授（體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）

題目：日尾荊山《毛詩諸說》與何楷《詩經世本古義》之關係

發表人：張文朝教授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）

題目：諸橋轍次與謝无量的《詩經》學比較：以《詩經研究》為探討對象

李雄溪教授從五則訓詁來看竹添光鴻《毛詩會箋》的獨到之處：1. 〈邶風·匏有苦葉〉「深則厲」之「厲」，《毛傳》云「以衣涉水為厲」，朱熹《詩集傳》同。戴震《毛詩補傳》解為「橋樑」，段玉裁、王引之(1766-1834)則反對此說，解為「石」。竹添氏並沒有直接引用清儒的分析，但據《說文解字》得出與段、王二人一樣的結論。2. 〈鄭風·山有扶蘇〉「乃見狂且」之「且」，歷代學者多釋為語詞，表「已」意。馬瑞辰(1777-1853)《毛詩傳箋通釋》解作「但」之假借，釋作「拙鈍」。竹添氏解為語尾虛詞，亦可作為發語詞和連詞。3. 〈小雅·六月〉「六月棲棲」之「棲棲」，竹添氏從實際歷史事實入手，指出六月出兵，以「棲棲」為「急」義。此說早見朱《傳》，竹添氏又以《論語·憲問》「丘何為是栖栖者與」之「栖栖」為證，有往來不止、惶惶不安之義。4. 〈小雅·瓠葉〉「有兔斯首」之「首」，鄭《箋》解釋為頭，朱《傳》解釋為量詞，竹添氏斥朱《傳》為誣文殊甚，但未說明理由。5. 〈小雅·苕之華〉「三星在罍」之「罍」，《毛傳》訓為「曲梁」，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訓「罍」（屋水流），朱《傳》訓「筍」，竹添氏以「三星在罍」寫水中情景，指百物凋敝、饑者不飽，視「罍」為捕魚之器。李教授舉五

則訓詁代表竹添光鴻能詳參中國學者的訓釋，提出中肯且令人信服的解釋，是與中國說《詩》者跨時空的對話。

張政偉教授和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八百谷晃義教授，聯名發表〈日尾荊山《毛詩諸說》與何楷《詩經世本古義》之關係〉一文。日尾荊山的漢學師從龜田鵬齋(1789-1859)，國學師從清水濱臣(1776-1824)，是折衷派的重要學者。其《毛詩諸說》與晚明學者何楷(約1591-1646)《詩經世本古義》資料多有雷同。《毛詩諸說》不錄全詩，先錄《詩經世本古義》篇名下的正文、注文，分別稱為「小引」、「小註」；之後針對詩中某章、某句為條目，以抄錄資料為主，用案語表達個人意見。最後常有評論豐坊(1492-1563)《魯詩世學》與郝敬(1492-1563)《毛詩原解》的意見。此種抄錄資料、於案語表達裁斷的學術風格，屬於折衷派的學風。經過文獻資料比對可知，《毛詩諸說》是節錄《詩經世本古義》的著作。若再分析其節錄狀況，相較於《詩經世本古義》，日尾荊山對朱熹《詩集傳》接受程度較高。本書最有價值之處，是對詞語的考釋。其中有二則文獻為《毛詩諸說》引錄，然未見於現今流傳《四庫全書》本《詩經世本古義》。一是〈騶虞〉「一發五狍」引張鼎思(1543-1603)《瑯邪代醉篇》處，一是〈綠衣〉釋朱《傳》「少艾」條引《講四書隨筆》處，這可能是日尾荊山的個人增添，亦可能是其所見《詩經世本古義》版本與今本不同。

楊晉龍教授於中文學界首先揭發謝无量(1884-1964)《詩經研究》抄襲日本學者諸橋轍次同名論著事件。張文朝教授廣續探討相關問題，發表〈諸橋轍次與謝无量的《詩經》學比較：以《詩經研究》為探討對象〉一文，深入比較兩書異同。本文首先概述兩人生平與學經歷。諸橋轍次從小接觸漢文學，日後講學也以漢文學為主；謝无量亦從小學習四書五經，但講學不限傳統經學。前者因要研究中國哲學及文學而留學中國，之後完成《大漢和辭典》，致力傳播漢學知識；後者因避禍逃至日本，介紹西洋新思潮。在《詩經》研究方面，謝无量調動、合併諸橋氏書之章節順序，意譯原文，加上自己的看法，並有意刪去中、日比較的部分。本文再以諸橋氏書第四章〈作為經的《詩經》〉為例，歸納謝无量有十種改寫方式，分別為：
1. 少部分為直譯。2. 大部分為意譯及己意。3. 有誤譯之處。4. 用諸橋轍次詩例說己意。5. 將原著論述作為己論之旁證。6. 大段地刪去原著論述。7. 刪去原著對中與日、歐美之比較。8. 刪去原著所引部分詩句。9. 對調原著詩例及論述順序。10. 改寫原著，提出己意。諸橋轍次《詩經研究》雖屬傳統研究，但其身居西化潮流，亦

常運用民俗學、社會學與西洋文學的觀點來研究《詩經》，謝无量以此十種方式改寫諸橋氏書，後者並非原創之作，但對中、港、臺《詩經》學有重要影響。